

翻译协调理论研究

张 慧 琴 著

ISBN 978-7-503-06400-8

望着眼前刚刚完成的书稿，我思绪万千。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张慧琴先生严谨的学风与谦逊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其次，我要感谢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高健先生。从大学时代第一天耳闻高健先生，到毕业后参与高健翻译思想研究，直至高健翻译理论之论著，不觉中先生指引我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高健先生治学严谨、开拓创新，为师的博学睿智、谦逊认真，闲谈中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无不让我受益匪浅。高健先生严谨的学风与谦逊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慧琴 著

我还要感谢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教学委员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前任总编、学界公认的中国英语领军人物——中国海洋大学的杨白俭教授在该书成形阶段给予的建设性意见，特别是在病榻前坚持为该书完成序言。先生的为人处世、对事业的热爱与敬业精神令我备受感动与鼓舞。

我还要感谢山西省翻译协会会长、山西外语教学协会前任会长、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正任教授对我二十年如一日的指导与鼓励。先生为人、治学与管理协调之魅力，犹如春风化雨，时刻滋润在我的心底。

我还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炳松教授、傅德明教授和许余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田贵森教授和郑海凌教授，暨河南大学的张南群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葛校琴教授、河南大学的蔡新乐教授、暨太原大学的贾正传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的洪传英教授和申屠善教授，山西理工大学的郑仰成教授和曹晓平教授、太原理工大学聂建刚教授等。山西理工大学的曹晓平教授等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的宝贵建议以及出版社高美斌编辑等的大力帮助，使本书顺利出版。

最后，我还要感谢山西大学刘汉云教授一直以来在教科研方面给我的莫大鼓励、关怀和栽培。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领导、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山西出版集团

SHANXI PUBLISHING GROUP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太原市迎泽大街100号

书前语

张慧琴的这部译学专著研究了我的一个理论——协调理论。我很高兴，也非常感谢她；撰写过程中曾有过多次交谈，感到相当受益。她的研究充实和发展了原来的理论，这就是此书的价值所在。今天书稿即将付梓，她请我作序，固辞不获，只得应命。但一则因仍有病在身，不能伏案，二则此研究涉及我个人，出于避嫌，似亦不容我更多置喙，故只能约略谈谈。我以为，理论的产生，实践乃是它的最主要的推动起因与诱发契机；当然也偶有理论前行的时候，但一般而言，先有实践后有理论还是常规——我的这个理论便也属后者的情形。完全缺乏实践而想提出什么理论，这通常是难以想象的。其次，事物的成长都得有它的一个过程，理论也不例外，不是一切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它不可能在一瞬间就一切完好无缺，周到齐全。我们对它暂时的欠全面、欠完善、欠深刻或欠齐备等似亦应作如是观，因而在看待上不能不稍存雅量和稍具耐心，否则是会有“求全之毁”的。对待任何一个理论是如此，对待它们的任何一项研究同样也贵乎能如此。毕竟一切终将决定于其自身，而非世间毁誉所能完全影响。今扶病聊缀数语，以作为对慧琴同学苦心与苦功的回报，并兼以祝贺。我坚信，此书的撰写本身便是对翻译理论发展与推进的一项贡献，其成绩是显著的。

高健

全国资深翻译家

2009年正月十五

独辟新径论协调

——《翻译协调理论研究》序

斗五王

张慧琴请我为她刚刚完成的《翻译协调理论研究》一书作序，我欣然答应。这是继秦建华教授的《高健翻译研究》之后对高健翻译理论进行系列研究的又一新作。该著的完成无疑标志着我们山西高校青年教师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又一新收获、新成果。

高健先生的译笔可谓情辞义理俱佳、节奏色调均胜。其好处从 20 世纪的《英美散文六十家》就逐渐为人知晓，但成功实践的背后依托着怎样科学理论的指导，却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而该著的写作缘起与意义恐怕也就在此。

全书从高健翻译协调理论写作的缘起入手，剖析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现状，探索翻译协调理论的创立背景、协调理论产生的客观需要和理论依据以及协调理论的科学定义与实施策略，筛选文学翻译中十对主要矛盾的协调处理进行理论阐述，结合高健等名家译文进行实例论证与赏析，进一步阐述协调理论是高健翻译四论（相对理论、复式语言理论、语言个性理论以及停顿理论）之核心。同时，选取典型实例论证协调理论的发展方向与完善途径，并以高健先生访谈录的形式探索高健成功翻译之历程，有力地论证了协调理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我以为，本著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尝试改变翻译家研究面面俱到之传统模式，将研究聚焦于高健协调翻译理论，结合大量实例来分析论证其在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该研究方法重点突出，人物个性鲜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便于读者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把握翻译协调理论，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二是通过作者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流，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既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依据，也为后人对高健翻译协调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三是尝试将协调翻译理论以规范、凝练的语言科学定义，追溯“调和”到“协调”的转变，阐释协调理论之内涵。四是强调以追求“真、善、美”的协调统一为翻译的最高理想，取各家所长，将“协调为手段，和谐为目标”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五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以和谐的态度、协调的手段，共同查找被研究者翻译实践中的缺憾，探索协调理论完善之手段，这在翻译研究史上并不多见。六是该著篇末对被研究者的访谈，真实再现了该著的写作历程，使其研究的鲜活性与可靠性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再说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翻译协调理论研究》序

这次受张柏然先生邀请去太原的中北大学参加“2008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除了跟与会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学术交流之外，还有两个额外的收获。一个是实现了跟高健先生相会的愿望。高先生学问深厚，散文翻译得精妙。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我选编《翻译新论》那本文集时，为选高先生的大作《浅谈散文风格的可译性》我们通过信。后来高先生在他的学校山西大学主持林语堂学术讨论会，给我发了邀请函，我因为工作走不开，很遗憾失去了一次相见的机会。1996 年花城出版社的秦颖出席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青岛大会，会间他问起散文翻译问题，我建议他请高健先生翻译兰姆的散文。1999 年秦颖寄来了高先生译的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让我进一步感受与领略了高先生翻译散文的水平和功夫，也得以感悟他在《译后语》中反复强调的翻译的最高原则——“调和”（高先生原用语为“调和”，后经其弟子与高先生商讨同意改用“协调”）。我还应秦颖之约为此书写了篇短评。2004 年秦建华寄来他的《高健翻译研究》，我得以进一步了解高先生关于“协调”的翻译思想。我和高先生真是相见恨晚，这次我们一见面就谈起了翻译，谈起了人生。大会上真真切切地聆听了高先生代表老一代学者的高亢的呼声：“中国学者的翻译学著作应尽快摆在外国学者的书架上！”。

另一个收获就是（因为我眼睛白内障不能看书稿）得以细听高健先生的高足张慧琴老师解说对高先生“协调”思想的研究。她不但讲了对“协调”的理解、界定和高先生这个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且讲了“协调”的分类与功能，最后部分是用翻译的实例来验证上述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有效性。中间我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她都能详细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从她的解说与回答问题中学到了很多，对她的这项研究也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读者一定想了解我们讨论了哪些问题，那我就择其要点说说我的看法。

2003 年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请我为他的大作《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作序，我曾就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谈了一些看法。今天，借此机会就这个问题再说说我的另外一些想法。

1. 一个翻译家的研究和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有什么关系？

张慧琴的这项研究属于对老一代翻译家的研究，其核心即是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这类研究有没有范例？研究一个翻译家目标如何确定？

专门研究一个翻译家的书不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秦建华那本外，我印象深的有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写于1963年3月，初载1964年6月《文学研究集刊》第1期。1985年再次发表，在《翻译通讯》第11~12期连载，比《七缀集》版本多一条注，文字也稍有改动，为最后定稿本）、高惠群与乌传袞的《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沈苏儒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钱先生的文章是名家经典，著名的“化境说”就是出自这篇宏文。高、乌二位先生的著作虽然只有146页，但颇有史料价值，既有严复译著的统计与介绍，又有《天演论》全书译文和译者按语字数的统计，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严复翻译言论选录和严复年谱。沈先生的书有了现代译学理论意识，而且有历史的考察与中外的比较，但由于他用了不科学的方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证明“信达雅”的生命力），所以此书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上述著作都没有论及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一般说来，研究一个翻译家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为翻译家不同，研究者的目标不同。但王佐良先生曾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他译了多少书？根据什么原本译的？译文的得失；翻译主张的由来（有什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文化界情况？等等）是否真的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中途有无变化、修正？对翻译界的影响；与其本人创作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评价。也可用同样的问题来研究任何别位作家兼翻译家。”

这个框架可以说有较高的普适性，但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只有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这个翻译家，才能作这样的研究。从已出版和发表的翻译家研究来看，还没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希望引起翻译家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2. 什么是传统译论？

传统译论（包括中外）就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在翻译史上留下的对以翻译性质和翻译标准为中心的有关问题的认知模式及其结果。其特点是主要范畴界定不严，外延内涵不清，常被后人给予多种理解和解释。

这种认知模式不仅古代和近代人有，现代人也有。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与“形似”，钱钟书的“化境说”，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三美说”，高健的“协调论”，郑海凌的“和谐论”等都属于传统译论的范畴。

3. 什么是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

所谓现代转化，就是用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用现代翻译学理论对传统译论中的主要理论范畴给予现代的阐释，就是寻找传统译论与现代译学在理论

实质上的通约性，以打通现代译学对传统译论的继承关系，从而促进现代译学理论的发展。

具体来说现代转化首先是用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传统译论中的主要范畴进行分析、评判，区分出时代、民族、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所赋予的区别性特征，和不受时代、民族、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局限的生命力长久的通约性；其次是要用现代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范畴从外延和内涵上给予新的界定。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对传统译论中理论范畴的改造，所以这是现代译学理论建设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就是新范畴的创建）。

4. 为什么要进行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工作？

一方面，这是现代译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因为现代译学理论的建设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译论中的精华，这是现代译学理论发展的源泉之一。如果缺少了这个批判地继承过程，那就成了无源之水。另一方面，这是传统译论历史价值的延伸和发展。因为传统译论的历史价值不是死的东西，而是有生命的东西，其生命在于后人的发掘和所赋予的新的理解和阐释。比如，吴文俊先生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国古代算法的发掘和阐释，徐通锵先生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字本位的发掘和阐释等都是成功的范例。

5. 怎样进行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

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前面说到的两条只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其他如范畴的来源及其原义，比如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与“质”，中外译论中的“归化”与“异化”等。范畴的来源及其原义都需要作繁杂、深入而系统的考证。还有范畴含义的历史变迁也需要作很多考证、比较与辨析的工作，如不下这种功夫就很难区分其区别性特征和通约性。

还有重新界定这些范畴也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包括外延的划分和内涵项目的选择与区分等，都需要做很多分析、比较、选择和综合的工作。我曾依照这种思路对“翻译”和“翻译学”两个范畴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载于方梦之先生主编的《中国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杨自俭

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

2009年正月初三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3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3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4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2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6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7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8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9
	一 翻译与文学研究	10
1	第一章 绪论	1
3	第一节 高健翻译协调思想研究背景	3
5	第二节 高健翻译成就及翻译思想研究现状概述	5
7	第三节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7
11	第二章 翻译协调理论概述	11
13	第一节 翻译协调理论创立之历史背景	13
15	第二节 翻译协调理论产生之客观需要	15
16	第三节 翻译协调之理论探究	16
16	2. 3. 1 翻译协调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西方语言学、 心理学研究之契合	16
18	2. 3. 2 从共时矛盾和历时矛盾分析协调之必要性	18
19	2. 3. 3 协调贯穿于翻译之全过程	19
21	2. 3. 4 翻译协调理论之内涵	21
23	第四节 翻译协调理论之实施策略	23
23	2. 4. 1 协调之前提与条件	23
24	2. 4. 2 协调之标准与要求	24
25	2. 4. 3 协调之幅度与范围	25
3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39
41	第三章 翻译中诸关系与矛盾之协调	41
43	第一节 文学翻译中五组对立关系之协调	43
44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中八组对话关系之协调	44
45	第三节 文学翻译中十对主要矛盾之协调	45
46	3. 3. 1 艺术性与科学性之协调统一	46

3. 3. 2	内容与形式之协调统一	49
3. 3. 3	整体与细节之协调统一	56
3. 3. 4	语言民族性与语言自然性之协调统一	62
3. 3. 5	英汉民族思维之协调统一	70
3. 3. 6	形合与意合之协调统一	75
3. 3. 7	异化与归化之协调统一	82
3. 3. 8	历史风格与时代风格之协调统一	95
3. 3. 9	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之协调统一	100
3. 3. 10	译者的“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之协调统一	117
ε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24
2		
	第四章 翻译协调之例证	127
	第一节 英汉协调翻译之例证	129
11	4. 1. 1 美文之协调翻译	129
ε1	4. 1. 2 《盖兹堡献仪演说》四个译本比照	167
ε1	4. 1. 3 散文《英国乡村》两个译本比照	173
10	4. 1. 4 诗歌之协调翻译	179
	4. 1. 5 诗歌译文鉴赏之实践	182
10	第二节 汉英协调翻译之例证	202
18	第三节 “嵌字游戏”之协调翻译	210
10	第四节 协调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尝试	212
1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16
εε		
	第五章 协调理论之发展与完善	217
44	第一节 协调理论之发展	219
εε	5. 1. 1 协调理论	219
	5. 1. 2 相对理论	220
	5. 1. 3 复式语言理论	221
14	5. 1. 4 语言个性理论	222
ε4	5. 1. 5 停顿理论	223
44	第二节 协调理论之完善	223
ε4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30

第六章 结语	231
附录 高健先生访谈	235
参考文献	249
后记	25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高健翻译协调思想研究背景

20 世纪是翻译的世纪。

20 世纪百年翻译史是人类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犹如一条历史长河，源远流长。中国文学翻译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时期，较为系统地译介外国文学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在这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的译家奉献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吸取外国文学养分，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增进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诚如季羨林先生（1993：10）所言：“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在长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众多翻译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就译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对翻译活动、文学翻译的特殊本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特别是近 30 年，我国翻译界日益重视对这些宝贵经验和独特见解的整理和思考，诸多翻译家和翻译研究教学工作者还对文学翻译进行了理论探讨，如王佐良先生的《论诗的翻译》、许渊冲教授的《翻译的艺术》、高健教授的《英美散文六十家》和《翻译与鉴赏》、杨自俭教授的《译学新论》、冯庆华教授的《文体翻译论》、张今教授的《文学翻译原理》、申丹教授的《小说文体学和小说翻译》、许钧教授的《翻译论》和《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郑海凌教授的《文学翻译学》和《译理浅说》、范守义教授的《翻译研究：另类视野》、赵彦春教授的《翻译学归结论》、韩子满教授的《文学翻译杂合研究》、孙会军教授的《普遍与差异》、周方珠教授的《翻译多元论》、秦文华教授的《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童庆炳教授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姜秋霞教授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成邵伟教授的《文学翻译概论》、董明教授的《翻译：创造性叛逆》、毛荣贵教授的《翻译美学》、秦建华教授的《高健翻译思想研究》、张思洁教授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何三宁教授的《翻译多元论实证分析研究》和黄振定教授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性的统一》等等，所有这些论著都先后为我们研究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卞建华教授在系统、全面地梳理我国翻译研究现状后,提出了三点反思性意见:“第一,国内现有研究显示出不平衡的特征,如评介类文章多,研究类文章少,应用文翻译类文章多,文学翻译少;第二,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还比较零散,肤浅,缺乏集中深入的分析;第三,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功能主义目的论几个重要原则和概念的引证上。”(陈大亮,2007:49)

穆雷教授(2003:15)也曾针对我国目前文学翻译研究现状,在《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指出:“在翻译研究史上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研究的重点一般都集中于对翻译的性质、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的技巧,即‘怎么译’方面的探讨,而对翻译的主体——翻译家本身,则缺乏系统的、有深度的研究。如现存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集记》,其中《述列传》就是译经人的传记,立传共三十二人,属最早的译家传,既追溯翻译史,又探讨名家翻译的心得体会。甚至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在其《翻译文学与佛典》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也曾逐一评论著名译家的翻译及其文体。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上述研究多为翻译家生平记叙、翻译活动介绍或其译品的赏析。”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兴起与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凸显,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重要转折。意识形态和时代的文学观念都通过译者对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翻译家的选择、翻译的方式、翻译的策略等等又反过来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必须对翻译家本身展开深层次的研究。

事实上,我国对翻译家比较有意识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翻译通讯》副刊常常刊登翻译家本人的回忆录或别人撰写的翻译家介绍,二者均以介绍翻译家的翻译经历和主要成果为任务。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1982年,该馆又出版了《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同类著作还有:《朱生豪传》(1989)、《翻译家严复传论》(1992)、《傅雷传》(1993)、《百年翻译家传略——曹靖华》(1998)和《翻译家周作人》(2001)等。80年代末,开始出版翻译家辞典,如《中国翻译家词典》(1988)、《翻译家词典》(1989)、《中国科技翻译家词典》(1991)、《译苑人物》(1990)、《中国翻译词典》(1997)以及《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大词典》(2001)等。进入90年代,才逐渐出现对翻译家群体有系统、有目的、有主题的研究。如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李亚舒的《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1993)、穆雷的《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郭著章的《翻译名家研究》(1999)、许钧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2001),以及《巴别塔文丛》(2002)等等。(穆雷,2003:13)特别是近几年的《张谷若翻译艺

术研究》(2004)、《翻译家鲁迅》(2005)、《傅雷谈翻译·怒安》(2005)、《季羨林谈翻译》(2007)、《翻译家周作人论》(2007)以及《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2008)等,都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探测性的研究。

正如穆雷教授(2003: 13)所言:“中国的翻译家研究大致分为五种类型:①发表于各种刊物的介绍翻译家的生平简历和译著成果的文章;②以已故著名文学翻译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翻译家传记;③简明扼要地叙述翻译家的生平和翻译成果的翻译家辞典;④以评介为主的对文学史和翻译史中的翻译家的论述;⑤专题翻译家的研究。每种类型的研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依照中国传统的‘盖棺论定’观念,似乎只能在研究对象去世之后才可定论,才可树碑立传。”孰不知翻译家的研究绝非仅仅整理他们的译作,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在翻译实践中翻译技巧的成熟过程和翻译观念的转化过程,以及他们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某种翻译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通过与翻译家面对面的交流,亲耳聆听并记录一些他们没有写出来的感受,才能使研究更加真实、生动、可靠、全面。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在经过与全国“资深翻译家”高健本人多次的交流之后,拟以高健翻译协调理论为核心,具体阐述、论证协调理论在翻译中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以期丰富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第二节

高健翻译成就及翻译思想研究现状概述

辜正坤教授(2002: 4)曾在 *Meta-translatology* (《玄翻译学》) 一文中说:“一种翻译理论之所以构建不当或推理有误不一定是因论者才疏学浅,而可能是由于其人过于善良、懦弱、或怪异——也就是说,可能与其个性或品格有关。”在他看来,玄翻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要搞清翻译理论与该理论信奉者或创建者个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信奉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取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翻译协调理论的创建者,高健是怎样的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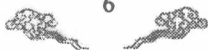
高健,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29年8月生于上海,祖籍天津,成长于世代书香之家,祖父与外祖父均为前清翰林,其父为留美物理学博士、教授。高健自幼在北京读书,1947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外语系,曾师承张秀亚(台湾作家)、张万里与张谷若三位译界名家,1951年毕业后至1954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工作,1956年夏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高健文学功底深厚,自幼注重从中国文学、小说、诗歌、辞赋、西方哲学、

汉语典籍、野史、杂记、随笔等各类体裁作品中吸取营养，仿写旧体诗，品味西方不同时代的戏剧，酷爱本国的昆曲、京剧和元曲，所有这些底蕴的积累使他自身的翻译实践主要锁定在英美散文、诗歌、小说与幽默作品的汉译，并注重翻译理论的提升。先后撰写了《翻译中的风格问题》、《浅谈散文风格的可译性》、《语言个性与翻译》等系列论文，分别发表于《翻译通讯》、《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等知名刊物。同时，高健还出版了系列译作与论著：《英美散文六十家》二卷（1981~1984，山西人民出版社）、《英美近代散文选读》（1986，商务印书馆）、《圣安妮斯之夜》（译诗集，1988，北岳文艺出版社）、《英诗揽胜》（1992，北岳文艺出版社）、《英国散文精选》、《美国散文精选》（1996，北岳文艺出版社）、《欧文见闻礼记》（1996，花山文艺出版社）、《英美散文一百篇——英汉对照本》（2001，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培根论说文集》（2001，百花文艺出版社）、《利考克幽默精华录》（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与鉴赏》（200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伊利亚随笔》（1999年第一版，2007年第2版，花城出版社）等，这些散文与诗歌等作品曾被选入百余部各类选集或教科书中。高健因此也成为英语翻译界首屈一指的大家，1991年获“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并被杨自俭先生（1994：120）评价为：“高健先生是个刻苦、严谨的翻译家，在翻译散文和诗歌方面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从他出版的书可以知道，他是萧乾先生称赞的那种‘阵地翻译家’”。高健现已八十高龄，但精神矍铄，至今仍以翻译事业为己任，笔耕不辍。2005年被全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高健翻译成就以及对翻译诸多方面的独到见解引起了译界同仁的高度重视。1993年，《外国语》刊登了山西大学外语系王正仁教授撰写的《高健翻译艺术初探》，开高健翻译艺术研究之先河。随之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高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文章时有所见，特别是对外贸易大学的贾文浩教授、花城出版社的秦颖先生等的文章，都有较大影响。

2003年5月，《中国翻译》的第3期刊登了山西大学王玉英教授的《两种变异类比观：文化变异与译语变异——对高健语性理论的一些思考》，对高健的语言个性理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引起了翻译界的广泛关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山西运城学院秦建华教授的《高健翻译研究》，使高健的翻译思想引起了整个译界的再度重视，该著作将高健的翻译思想归纳为协调理论、相对理论、复式语言理论、语言个性理论与停顿理论，并认为语言个性理论是其余四论之核心。同时，该书在篇末的“一个学派正在形成”中，提出了关于高健协调理论可以继续研究的系列论题，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思路。



第三节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理论、翻译史与翻译批评等方面。

本研究选题不同于翻译史研究中对翻译家的追溯研究，而是属于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翻译家研究范畴。人们发现，在翻译史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抢救翻译史料。特别是随着译界著名的翻译前辈叶君健、董乐山、钱钟书、萧乾、赵瑞蕪和冰心等老人相继离世，以及许钧教授在《译林》杂志上主持的访谈栏目——《翻译漫谈》中的永恒遗憾，都使笔者更加坚信高健翻译思想研究之意义与优势。其原因是翻译家的形象因其蓬勃鲜活的生命力而生动具体，翻译家的思想因其时代性而与时俱进，翻译家的实践因其不断创新而独具魅力。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在对话与文本研究中了解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历程，研究翻译家的翻译理论，丰富中国译学建设，发展翻译文化，使翻译家研究更具真实性和全面性。具体体现为：

(1) 凸显高健翻译协调理论研究之时代性

基于其他学者对高健先生的翻译研究，聚焦其翻译协调思想，主题鲜明，时代性突出。协调思想不仅是翻译活动的指导思想，也是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协调理论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协调占据主导，意义效果的协调予以强调；节奏与色彩的协调再次关照，语言使用的多重性与复式性反复推敲。翻译实践中正是通过这方方面面的协调，使翻译效果在“求同存异”的和谐目标中不断提升。

(2) 论证高健翻译协调理论研究之现实意义

高健的译文因其词意俱佳、形神兼备、格调高雅、质量精美，曾被国内近百种外国散文选本收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好评不断上升。在新近出版的由余建明选编的《英美散文名篇精华》中，高健译文不仅被评价为“堪称绝美，其珠玉文章之光泽寰宇共见，我辈共仰嵩山”，而且也受到了著名翻译家黄任先生的盛赞，认为高健先生在散文翻译方面的造诣，已臻炉火纯青。所有这些翻译成就，都使高健翻译思想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 调整高健翻译协调理论研究之重心

笔者在向高健本人的多次求教中逐渐证实：在高先生的整个翻译实践中，语言个性理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其他四论之核心，而协调理论既是相对理论、复式语言理论、语言个性理论与停顿理论之核心，也是高先生翻译实践的最佳